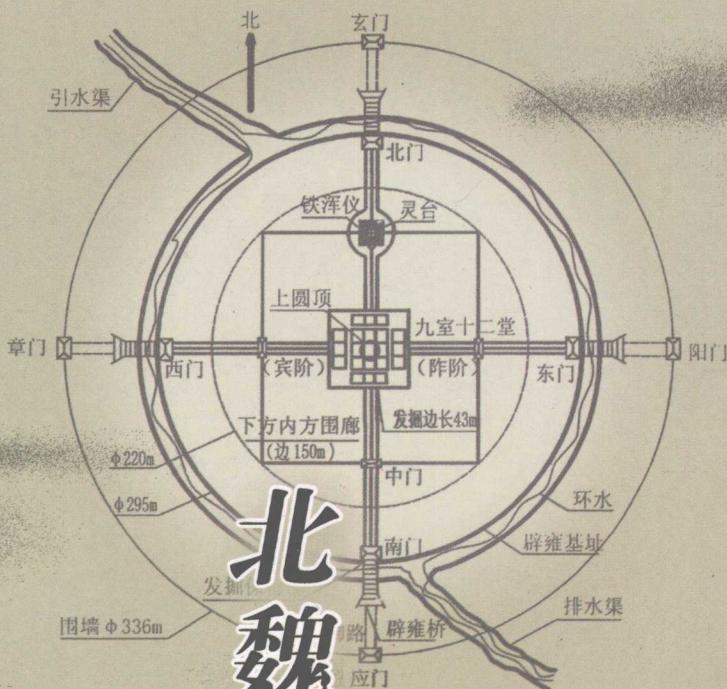


大同历史文化丛书（第七辑）
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

赵一德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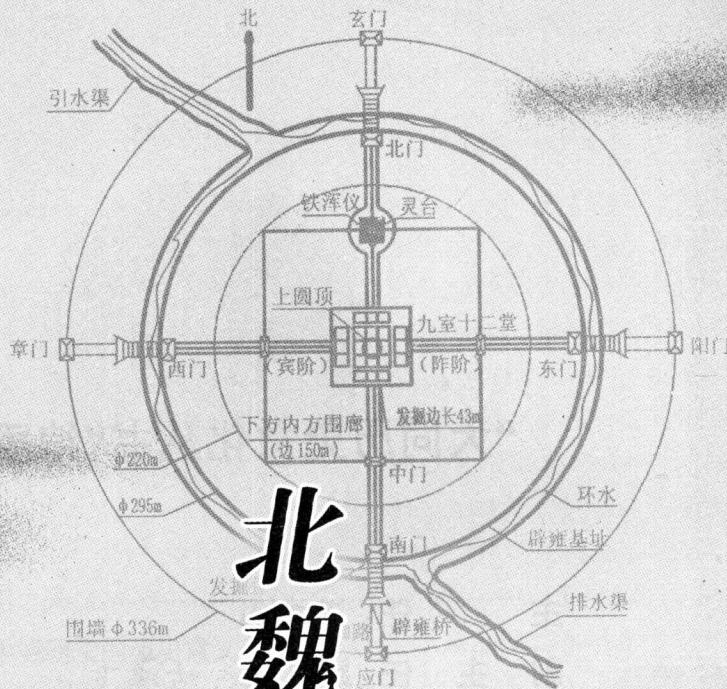


北魏平城明堂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赵一德著

大同历史文化丛书（第七辑）
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



北魏平城明堂

山西出版集团
◆山西人民出版社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魏平城明堂/赵一德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
2007. 11

(大同历史文化丛书·第7辑/董瑞山主编)

ISBN 978—7—203—05875—5

I. 北... II. 赵... III. 礼仪—制度—研究—中国—北魏(439~534) IV. K892. 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23511 号

北魏平城明堂 (大同历史文化丛书·第7辑)

著 者: 赵一德

责任 编辑: 蒙莉莉

装帧设计: 冀小利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—4922220 (发行中心)

0351—4922208 (综合办)

E-mail: fxzx @sxskcb.com

web@sxskcb.com

Renmshb@sxskcb.com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山西省史志印刷厂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总 印 张: 16.875

总 字 数: 500 千字

印 数: 1—3000 套

版 次: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203—05875—5

定 价: 86.00 元 (全 10 册)

“大同历史文化丛书”编委会

主任：董瑞山

副主任：高平 古鸿飞

委员：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力高才 古鸿飞 赵一德

姚斌 要子瑾 高平

袁海明 葛世民 董瑞山

主编：董瑞山

执行副主编：高平 古鸿飞

副主编：葛世民 姚斌



目 录

引 子	1
平城明堂的历史意义	2
平城明堂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	4
诠释《水经注》对平城明堂的记载	11
平城明堂在明堂史中的地位	20
平城明堂的功能与应用	28
历史文献对平城明堂的议论	40

目
录



北魏平城明堂，在中国明堂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是划时代的杰作；是北魏“太和改制”中礼制改革（意识形态改革）的具体实物证据。但是由于它使用的时间太短，加之建筑物存在的时间不长，因而被历史淡忘，甚至鲜为人知；又由于它对汉晋明堂制度改革的幅度太大，因而引起隋前儒家学者的不少非议。自 1995 年平城明堂遗址在大同出土后，笔者经过近 10 年的考校，认识到它对中国明堂制度发展的重要贡献，因而撰此文。本文从平城明堂考古中所发现的资料，考订了平城明堂的规制与其特殊形态；又运用文献资料，论证了它在中国明堂制度中的历史地位；又引用其功能所发挥的作用，印证了“太和改制”中礼制改革的成就；最后用史论文献，对它作了评价。

1995 年在大同市旧城东南发现明堂遗址，经过 1995 年、1996 年的考古发掘和论证，在 1997 年已经基本认定它是北魏太和时期的“明堂辟雍”遗址。1999 年《发掘简报》面世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刘俊喜先生等在山西省考古学会上公布），这项考古发现就正式公开了。这是平城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，其意义有许多方面。

本文拟对平城明堂的表现形式与其所反映的北魏文化，乃至它对中国礼制文化的贡献等作一些探讨。



引
子

平城明堂的历史意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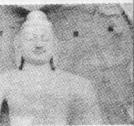
平城明堂，除了对“平城”的都城地理定位有决定性的坐标价值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对北魏的历史文化之认识有纠正偏见的作用。在中国旧史观上，历来对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——北魏拓跋鲜卑政权持蔑视、贬抑，甚至歪曲的观念，并形成长期误解，认定北魏政权是一个文化落后的政权，甚至是野蛮的政权。这种偏见延续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，持疑古观念的古史辩派也没能纠正。新中国建立后，不少唯物史观学者也作过纠正方面的努力，但由于缺少文献史料以外的实物资料作佐证，所以还显得甚少说服力。平城明堂的考古发现，是一个难得的实物证据。

但是这个证据犹如一块璞玉，需要经过琢磨方能窥视其真容。本文试运用王国维先生的“二重求证”法，以出土的文化遗迹考证历史文献，以零散残存的文献资料考校出土的遗迹。相互印证，或可管窥蠡测，聊见一斑。

北魏平城明堂是伟大的，它的伟大，有以下六点：

- 1.从出土的遗迹看，其规模、制式是相当宏伟的。规模，可以和新朝王莽明堂相提并论；制式，则又突破周、汉以至魏、晋几经变化的明堂古制，而独创一格，且为隋、唐以后之明堂所望尘莫及。

2.从文献的记载看，它的建筑形式是相当奇特的。它彻



平城明堂的历史意义

底改变了自传说中的黄帝明堂，文献中的周明堂、晋明堂，以至有迹可考的长安明堂、洛阳明堂等所一直沿用的那种在“一大室”之内分隔为九室或五室的建筑形式，而改变为“三三相重”、“房间通街”的九室单立之新的建筑形式。这不仅是明堂建筑形式的一次大改革，而且在建筑结构上也有新的创造，有的地方还是很科学的。

3.对明堂的功能作了充分的扩大。不仅完全实现了东汉蔡邕的那种明堂、辟雍、灵台“三合一”的理想，而且在祭祀以外又纳入了许多其他功能，甚至还有一些科学的功能，给中国礼制文化中的祭礼文化增添了活力。平城明堂已经不单纯是祭天、祭神、祭祖之祭坛，而且是观天象、定音律、测度量衡之场所。这是在中国礼制文化史上，最早将科学与祭祀相结合的尝试，它虽然还显稚嫩，但影响深远。它奇特地展示了北魏文化的一个侧面，这一点实开隋唐科技之先河。

4.完整地表达了鲜卑人对汉族礼制文化的理解，体现出“汉化了的胡文化”的特色。分析平城明堂，不禁令人对这个东胡系的民族刮目相看。

5.反映出太和改制(或称孝文改革)的深层次。可以启发太和改制研究之范围应当有所延伸，即在政治、经济、习俗等实体改革以外，还要涉及意识形态的改革。表现在平城明堂的礼制改革，实质是文化观念的一次大革命。鲜卑人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，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，他们的意识形态及其礼制观念，大有超过同期甚至后期的汉族统治者之处。

平城明堂的考古发现 与文献资料

关于平城明堂的考古发现,这里选择《北魏明堂辟雍遗址南门发掘简报》中的数据为论考的基础资料。整理如下:

1. 遗址外围是圆形水沟,即“辟雍”。周长约900米,宽6~16米,深1.4米左右,两侧用砂岩块石垒砌,直径达290米,占地近百亩。
2. 遗址中央是一方形夯土台基,边长约43米(四边相等),是主体建筑“明堂”之所在地。
3. 遗址总平面呈圆形。在圆形水沟的内侧,设东、南、西、北四门,南门与西门的遗址经过发掘,规模宏大。
4. 辟雍南门基址。平面呈南窄北宽之凸字形,其最宽面(东西)24.7米,全长(南北)16.9米。全部系夯土筑成,圆形夯窝,弧形底。此门之北与中央主体遗存直对(中轴线),距离为105米。
5. 辟雍圜水的“圆水渠”,保留了南门基址南侧的一段(长29.5米,宽6~16米,深1.4米),呈环形,平底,两侧用砂岩条石垒砌,砌法为不等分的平铺错缝;底部用碎砂岩片石平铺一层防渗层。

从上列数据所显示的总体规模看,该遗址相当大。直径290米的辟雍圜水,相当于现存北京天坛圆丘坛底径91米的3倍还多。中央43米的正方形夯基,一面就几乎可以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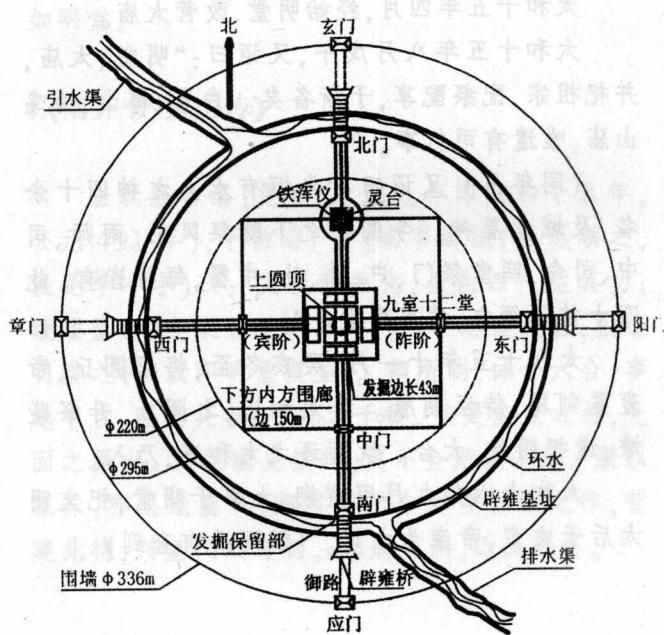
平城明堂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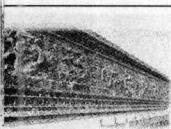
放一座“九间之殿”。当年这个台基之上，建有九室、十二堂，依北魏之“方坛四陛，壝埒三重”等规制来设想其立面形状，这上面重重叠叠的室、堂、坛、陛、阶、栏、墙等建筑，是相当壮观的。

辟雍之外还有圆形围墙(圆墙遗址这次考古未发掘，但文献有记载)。圆墙之外还有药圃、籍田、馆驿、流水、柳荫。如此一区文化设施，足以说明北魏礼制文化的不同凡响。

可惜的是，此处遗址几经破坏，特别是20世纪日本侵略者占领期间，修为飞机场，把地面遗存全部夷为平地；再加上近年楼群建筑的覆盖，使考古发掘受到极大的限制。所以这次考古所能给我们的信息，也只能局限于上述资料。进一步的探讨唯有求诸文献。

根据以上材料，试绘《北魏平城明堂辟雍总体布局设想图》：





关于文献资料，有下列文献可以见到：

1.《魏书·高祖纪下》：

太和十年九月辛卯，诏起明堂、辟雍。

太和十五年夏四月己卯，经始明堂，改营太庙。

太和十五年十月，是月，明堂、太庙成。

太和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，己未，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

太和十六年九月甲寅朔，大序昭穆于明堂，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。

2.《魏书·礼志一》：

太和十五年四月，经始明堂，改营太庙。

太和十五年八月戊午，又诏曰：“明堂、太庙，并祀祖宗，配祭配享，于斯备矣。白登、崞山、鸡鸣山庙，唯遣有司行事。”

(同年月) 又诏曰：“先恒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，及城北星神。今圆丘之下既祭风伯、雨师、司中、司命，明堂祭门、户、井、灶、中霤，每神皆有。此四十神不须立，悉可罢之。”

太和十五年十一月，癸亥冬至，将祭圆丘，帝袞冕剑舄，侍臣朝服。辞太和庙，之圆丘，升祭柴燎，遂祀明堂，大合。既而还之太和庙，乃入。

太和十六年九月甲寅朔，大享于明堂，祀文明太后于玄室，帝亲为之词。(祭词没有查到)



平城明堂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

3.《水经注·瀍水》：

其水自北苑南出，历京城内。河干两湄，太和十年，垒石结岸，夹塘之上杂树交荫，郭南结两石桥，横水为梁。又南迳籍田及药圃西、明堂东。

明堂，上圆下方。四周，十二堂、九室，而不为重隅也。室外，柱内，绮井之下，施机轮；[室内]饰缥碧，仰象天状，画北道之宿焉，盖天也。（王先谦引朱谋玮说为：“画北辰列宿，象盖天也。”）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，应天道。此之异古也。加灵台于其上，下则引水为辟雍，水侧结石为塘。事准古制。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。

其水又南迳平城县故城东。水左有大道坛庙，……其庙，阶三成，四周栏槛，上阶之上，以木为圆基，令互相枝梧，以版砌其上，栏陛承阿，上圆。制如明堂。

4.《南齐书·魏虏传》

宏既经古洛，是岁（永明九年即太和十五年，公元491年），下伪诏[于]尚书思慎（系思顺之，误是李冲字）曰：“夫覆载垂化，必由四气运其功；曠曜望舒，亦须五星助其晖。……思遵先旨，敕造明堂之样（或即明堂模型）。卿所制，体含六合，事越中古，理圆义备，可轨之千载。信是应世之材，先固之器也。群臣瞻见模样，莫不金然欲速造。朕以寡昧，亦思造盛礼，卿可即于今岁停官城之作，营建此构，兴皇代之奇制。远成先制，近副朕怀。”

5.《魏书·李冲传》：

冲机敏有巧思，北京（指平城）明堂、圆丘、太庙，及洛都初基，安处郊兆，新起堂寝，皆资于冲。

6.《隋书·牛弘传》：

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，上议曰：“后魏代都所造，出自李冲，三三相重，合为九室。檐不覆基，房间通街，穿凿处多，迄无可取。”

7.《隋书·宇文恺传》：

奏明堂议表曰：“后魏于北台城（指平城）南，造圆墙，在璧水外，门在水内迥立，不与墙相连。其堂上九室，三三相重，不依古制，空间通巷，违舛处多。其室皆用墼累，极成褊陋。”

上述文献，是如今仅能见到的直接记载平城明堂者，然而零零落落，很难满足完整地窥探平城明堂的需要，再加上撰著者的立场、观点各异，描述时各有取舍与侧重，议论时毁誉不一，令人很难把握。

这里先澄清作者的背景，以便探讨其所持之观点。

魏收所著《魏书》，是正史。尽管魏收声誉不佳，《魏书》亦有“秽书”之嫌，但此处不涉及人事，无褒贬之嫌，应当可信。

郦道元之《水经注》，声誉甚隆，尤其所记载北魏风土状况，多为其亲身经历者，最为可信，且文笔精妙，最有参考价值。



平城明堂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

牛弘之“议”就有偏颇。在隋开皇三年(583)上表,是为请求兴建明堂。表文引经据典、借题发挥乃文人习气。可惜他没有来过平城,没有目睹平城明堂之壮观,仅据传闻知道平城明堂之九室是“三三相重”而已。所以用轻蔑的评论,以鼓舞隋朝兴建明堂,目的比较单纯。可贵的是,奏议中提出“三三相重”、“房间通街”的资料,对今天的研究可就贡献不菲了。

宇文恺之“议”就更偏颇了。因为他本人在隋朝处于应杀被赦且二次受株连后又被起用,是戴罪之身。其“议”有为求生存、求立功的背景,议论偏颇或有隐情。不过他提出的“圆墙”和“堂上九室”的资料却极有价值,弥补了其他文献的空缺,也是贡献。

用上述文献资料,结合考古发现,互相印证,可以对平城明堂有一个轮廓性的整体概念:

- (1)规模宏大,内容丰富,气势磅礴,设计精巧。
- (2)是一座有创意性的明堂,既有符合古制(指秦汉魏晋)之处,又有不同古制(即所谓“异古”)的特色。
- (3)集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于一体,构成一区多元文化体,是秦汉魏晋以来礼制文化升华的反映。集中表现在它的“多功能”上,而且这种功能超出旧明堂体制。
- (4)该明堂的构造是九室、十二堂,而且不在一个台层(即所谓“堂上九室”)。九室的布局是“三三相重”,中间有通道,各室皆独立。十二堂的布局是“不为重隅”,则该十二堂是分布在九室下层台之四面,并与其上层之“每面各呈三室”相对应。(若有“重隅”则将出现十六个堂)。“堂”之大小则与“室”相等。

(5)此辟雍,气势浩大。仅从发掘的局部圜水渠,已可判断其形制之宽阔考究。渠两侧的砌石,长而坚固。渠底有碎石防渗。比之前后各朝的“辟雍”是绝无仅有者。

(6)灵台设在辟雍之上。是继周文王灵台辟雍之后，首次再现之“复古”。(此处若如周文王之灵台，则在辟雍中央，可能与明堂冲突；若如王莽明堂于灵台之位置，则可以选在辟雍北部之中轴线上。本文取后者。)

(7)辟雍之外有圆墙。圆墙遗址虽没有发掘，但在辟雍西南30~40余米处，有一段地貌呈圆弧状，且与辟雍为同心圆者。若能确定这里就是圆墙遗址，则可以把平城明堂的总直径框定在330(290+40)米左右。

(8)建造时间比较明确。是从太和十年(486)立项(或即冯太后旨意)并筹备(包括设计、备料、筹资等)，经过5年的准备(或因故搁置)，于太和十五年(491)4月开工，当年10月竣工。(工期仅半年多，虽然很短，但可以完成，且成就辉煌。)

(9)对该明堂的功能设计，可谓周全备至。虽然因为自太和十五年(491)建成至太和十八年(494)迁都，使用不过3年，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。但就在这短暂的3年多的时间里，它还是发挥了不少作用(后文叙述)。

(10)太和年间，平城的礼制工程不只是明堂一项，同时还有圆丘的修葺与太庙的重建(此太庙遗址的殿前台基，已经在大同城北的操场城发现，只是目前的认识尚有分歧)。这三项工程是“太和改制”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它是与政治、经济改革相呼应的意识形态改革。它不仅显示了太和时期礼制文化的成熟，还反映了鲜卑人对汉文化理解的程度。北魏在太和年间礼制文化能突破性地上升到这么一个空前的高水平，而且挑战了秦汉魏晋精心构筑的汉文化传统，是很值得研究与思考的历史问题。平城明堂遗址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。太和年间平城明堂所展示的，乃是“汉化的胡文化”。

诠释《水经注》对平城明堂的记载

通过上述 10 点认识,结合考古发现,对《水经注·瀍水》描述平城明堂的这段文字作详细核对与诠释如下。原文为:

明堂,上圆下方。四周,十二堂、九室,而不为重隅也。室外,柱内,绮井之下,施机轮;[室内]饰缥碧,仰象天状,画北道之宿焉,盖天也。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,应天道。此之异古也。加灵台于其上,下则引水为辟雍,水侧结石为塘。事准古制。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。

第一句:“明堂,上圆下方。”

这是自古明堂建制的通例,也是明堂的主体建筑的立面形状,还是明堂的耀眼标志。以前的建筑,是在一幢九室(或五室)连缀在一起的方形整体大建筑物上,覆盖一个圆形的屋顶,所以叫做上圆下方。

而平城明堂的主体建筑却不是一个整体大建筑物,而是分开的 9 个单室(即所谓的“三三相重”、“房间通街”)。这个“上圆下方”,只能体现在其中心的“太室”之上。而这个太室,体量不会特别大,所以它的圆顶也不会很大,再加上还有“檐不覆基”之说,这个圆顶也就很小了。但是圆顶虽小,



诠释《水经注》对平城明堂的记载

依然体现着“上圆下方”的特色。而尤为特殊的是，这个小小的圆顶，功能却大，就在这个圆形屋顶的室内的顶棚之上却有“盖天”图的设置，而且能够转动。这正是同为“上圆下方”却有所不同，此即平城明堂的“异古”之处。

第二句：“四周，十二堂、九室，而不为重隅也。”

要注意郦道元的这个叙述顺序，他是自外而内的那种登堂入室的写法。先从四周的十二堂写起，再谈九室，然后点出不为重隅。这既符合古制中“前堂后室”的顺序，又能显示出此处的立面层次。可以这样理解：首先入目的十二堂，是在外围第一层台上，分布在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方，各有三堂。升上第二层台，就是“三三相重”的九室。九室中央的太室又上一个台层，构成三层台制。（与宇文凯之“堂上九室”合）。“而不为重隅”是对下层的“十二堂”说的，该堂，对应上层之三室，扩大了一圈，倒是缺了4个“角堂”，因为没有补齐，所以说“而不为重隅也”。（关于“重隅”和“重屋”：《周礼·考工记》有“殷人重屋”、“四阿重屋”的记载。其“重屋”，与这里的“重隅”不是一回事。《周礼》之重屋，是在室内的“四阿”，四阿是指室内四角。而重隅，则是指室外“四隅”之建筑。四阿不是四隅，所以重隅也不是重屋）

第三句：“室外，柱内，绮井之下，施机轮；[室内]饰缥碧，仰象天状，画北道之宿焉，[象]盖天也。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，应天道。”（说明：这一句疑有脱漏，关键是室内与室外分不清。这里试着加入[室内]。并据王先谦校引朱谋玮云：“画北辰列宿，象盖天也。”这里加一[象]字，眉目就清楚了）

先释：“室外，柱内，绮井之下，施机轮。”

关于“室”与“柱”。按传统的理解是：“室”乃泛指大室（亦即九室在内之大室），那么其室外之“柱”，可以排列为28根，用以象征28宿。此说有蔡邕《明堂论》所记之：“二十八柱，列于四方，亦七宿之象也。”可为依据。

但是平城明堂是九室分开的，此“室”只能是指中间“太